

本地新作

有根的写作

——彭素虹的《我们》读后感

南志刚



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彭素虹长篇纪实文学《我们》，封面洁净大方，在白底上加红色剪纸画，颇有艺术感觉。读完整本书，这种感觉更明显，彭素虹的文字洁净素雅，出版社处理章节分页、插画，贯穿了封面的文化诉求。从写作到出版，都是一本“用心”之作，显现出向民间、向基层寻求文化之根的理念。

彭素虹用书信体讲述了四个家庭来宁波打工的故事，以女儿口吻向父亲汇报我和“老乡”在宁波打工生活的欢欣与痛苦，纪实的叙述态度、平静的叙述语调、稳定的叙述视角、清晰的叙述逻辑，为这篇纪实文学提供了“真实性”保障，将一个非虚构的故事变成成为一种有根的写作。

以有根的姿态书写无根的群体，是彭素虹《我们》给我的突出印象。“打工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实，只要我们看看每年春运的状况，就不难理解打工一族的艰辛。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，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每一个城市发展都深深地镌刻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印记，是他们长期超负荷的劳作、与收入不成比例的付出，支撑了城镇化高歌猛进。许多沿海发达城市，外来务工人员（包括新城市人）的数量远远超过“原住民”，构成了中国当代最为壮观的风景线。这些离乡背井的务工大军，长期处在基层，忍受着亲情难舍的煎熬，像浮萍一样在异地他乡“无根”地漂泊。忙碌的劳作、深沉地思念、频繁地游走，让他们无暇“言说”自我，导致群体性失语。即使偶尔有夹缝中的呻吟，也往往被现代性文化话语所湮灭。那种短暂采访而形成的纪实文本、那种抱着同情而书写的文体，许多是隔靴搔痒，难以深入到“底层人”生活和情感的深处、细处，只能借助虚张声势、人为编织，挖掘所谓深刻与宏大的意蕴。

谁来代他们立言？谁来发出基层的声音？作为一种责任感、使命感的基层写作、打工文学，在当今中国不仅是需要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作家，书写中国最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诉求，发出最基层的声音。因为，失去这种声音，整个中国的文化声音就出现残缺；这种声音表达不够充分，整个中国声音就不够响亮。

彭素虹就是来自基层的作者，《我们》就是一种基层写作。她本就是一个打工者，经历过打工的每一个细节，长期与“老乡”们在一起，熟悉他们的每一个细胞，触摸过他们布满伤痕的每一寸肌肤，感受过他们疲惫不堪的身心，也分享过他们的欢欣与慰藉。她与这庞大的基层群体有“通感”，套用一句话：同呼吸，共患难。《我们》不是走马观花式写作，不

是“作为”基层的写作，不是“为民请命”式的写作，而是本色写作，是一种有根的写作。她的根扎在打工者群体中，扎在打工的土地上，扎在“外来”人员的思乡情怀中。所以，她能够以有根的姿态，书写这些无根漂泊的群体。

有根就有底气。这种底气表现在叙述视角选择、叙述节奏把握、叙述线索设置等方面。

《我们》不像有些“基层叙事”、“打工文学”那样，或者渲染苦难，或者拔高境界，或者编织传奇。彭素虹采用了一种平静的“内聚焦”，将打工群体的生活叙述成为一种“常态”生活方式，没有苦大仇深，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自怨自艾式的喃喃自语，而是用一种平常心，向父亲汇报自己以及周边人物的日常生活。围绕着我、柳莺、杜鹃、黄鹂等四个家庭，所有人物的出场都极其自然，所有事件的发生都顺理成章，既没有“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”，也没有大开大阖、波澜壮阔。所有的故事、人物都是“平常”的，都处于日常生活的进行过程中。这种选择来自于彭素虹对打工生活的长期“浸淫”，已经失去了“惊奇”效果，跨过了“陌生化”的阶段。于是，《我们》的叙述节奏是平缓的，见不到丝毫激越澎湃的快节奏，几乎与实际生活“零距离”的叙述方式，抹平了许多起起伏伏、浪涛翻滚，即使偶尔遇到“风起云涌”的场景，作者也尽可能进行“海定则波宁”式处理。与叙述节奏保持一致，叙述语调是平缓的、平静的，作者用最大的勇气和宽阔的胸襟，淘洗了现场感的紧张和纠结，显示出乐观、豁达而祥和的情感基调，叙述王劳动受伤事件处理、柳莺卖房赔款、群体打架事件、季夏老公出轨过程中，没有把事件的现场感搬进小说，而是尽可能过滤事件现场的浮躁气息，采用“回忆”的语调、向父亲汇报的口吻，把故事控制在平缓、平静的叙述中。

如果说，“有根的写作”令我欣赏；那么，这个根扎得不够深、根系还不够发达，由此导致的枝叶不够繁茂、线索不够丰富、思考不够深入等，则是我想要对彭素虹提出建议的缘由。根深叶茂、根系发达，甚至像榕树一样有须根，顽强地、霸道地争取阳光和水份，才能成就一棵大树。《我们》中有些地方，已经接触到当代中国的深刻问题，可惜被作者轻轻带过，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“开掘”。如小说一开头叙述我和柳莺两家人从西南某钢铁厂辞职，实际涉及到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大课题，涉及到沿海民营经济发展的大课题，而两相对照，更能够昭示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轨迹。如季夏老公出轨，已经触摸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语境下、当代中国乡村伦理与人性健全发展的深刻问题，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基层务工人员，也检测着我们社会伦理观念的实际水准。如果在这些事件中，进行深入思考，再组织鲜活的生活材料，进行更有力的叙述，小说可以更上一层楼。

彭素虹是一个有情怀、有前途的基层文学书写者，希望她能够坚持有根的写作。在叙述语言层面，彭素虹已经是一个“熟练工”，但如何让语言更有质感，更有承受力，还需要不断努力，不妨让语言更驳杂一些，尝试多种声音混杂的语调。在情节设置方面，多一些枝枝杈杈，甚至节外生枝，情节推进可以再耐人寻味一些。

（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）

百家荐书

驳杂有趣的古之巫书

——读《〈山海经〉全译》

夏学杰

《〈山海经〉全译》是袁珂先生在《〈山海经〉校注》的基础上，精简了过于繁琐的学术性注释，增加了全文的白话翻译而成。本书重视学术性和资料性，更强调了通俗性，将晦涩难懂的《山海经》变得浅显易读，易于普通读者接受。

袁珂系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，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几十年，曾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，著有《中国古代神话》《中国神话传说》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》《古神话选释》《神话论文集》等。

远古时期的人们，大概一辈子也就生活在一个地方，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，他们是不大清楚的。我小时候，生活在小山村里，整日里看太阳从东升起然后落于西山头，便以为那两侧的山便是世界的尽头了。后来，爬到山顶，才知道世界很大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那时的人们估计也想走出去看看，但是交通工具不发达、食物储备又不多，走得出去吗？所以，这时巫师就显出自己的神通了，他们给人们讲述山外的世界，或许这就是《山海经》的由来。

《山海经》通常以一点为圆心，然后讲它的方圆几百里甚至几千里外的世界的样子，外边的世界都有什么样的山河草木以及国家。如书中说贯胸国的人胸前都有一个洞。厌火国的人都是野兽的，浑身黑色，火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。《山海经》读来挺有趣的，外边的世界竟然有跟他们长得很不一样的人。书中还说：羽民国的人都是长脑袋，身上生有羽毛。这些记述看上去似乎有些滑稽，但其实不然，通过读这些东西，能够了解当时处于蒙昧状态之下的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。他们对外界事物的猜想与理解，自然不能以我们当下人的常识来衡量的。比如，山海经是这样解释南方为何多雨的：大荒当中，有座山叫成都载天山。有个人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，手里握着两条黄蛇，名叫夸父。幽冥世界的统治者后土生了信，信生了夸父。夸父不量力，想要去追赶太阳的光影，将它在禺谷那个地方捉住。他追到半途，心烦口渴，想去喝黄河的水，怕不够喝，又想到北方去喝大泽的水，还没走到，就渴死在那里了。后来黄帝和蚩尤发生战争，应龙已经杀死了蚩尤，又杀死了帮助蚩尤作战的夸父——大约是追日夸父的子孙后代——神力用尽，上不了天，只得到南方去居住，所以南方一直多雨。

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：“《山海经》……盖古之巫书。”袁珂是很认同鲁迅的观点的，认为《山海经》是一本神话书，过去有学者将其归入地理书，他认为“实际上不过是处在混沌形态综合体中的神话地理罢了”。

袁珂说：“古时学者大都认为《山海经》是夏禹、伯益所作，这诚然是无稽之谈。但也不能说此书和他二人毫无关系。我曾为文说明传说中的禹、益（尤其是禹）虽非《山海经》的作者，但书中的主要内容，仍有可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长而兼巫师的禹、益口述而世代相传下来的，否则此书的作者便无由附会到二人的身上。”

《山海经》书中，记有好些神谱，有帝俊的神谱，有炎帝的神谱，有黄帝的神谱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和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基本上用的是与《山海经》一样的谱系。袁珂说：“从中可以知道原始初民是将口耳相传的神话视为他们的历史的。反转过来我们也就知道：在某些民族中巫师祀神时演唱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，讲述天地如何开辟，人类如何诞生，讲述祖先的业绩，英雄的战功，等等，在他们是深信不疑地视为是历史的，其实全都是神话。由此可证，在上古时期，神话和历史实在同出一源。”对于黄帝以及尧舜禹时代的历史，司马迁想必亦没有什么史料可用，他不用民间传说又用什么呢？远古时期的历史记载与神话同源，恐怕亦为史家之共识。

《山海经》这部书，一般读者没有注释恐怕是很难读懂读通的；有了详尽的注释，读者就可以轻松地领略这本中国古代奇书的意趣，但离读懂读通还是有一定距离的。



《山海经》明朝版本中“夸父逐日”的插图